

# 古代语文论稿

聂鸿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古代语文论稿

聂鸿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语文论稿 / 聂鸿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61 - 3957 - 8

I. ①古… II. ①聂… III. ①古汉语—文集 IV. ①H10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37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华祖根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158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52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这里选收了我近三十年间写下的古代语文学方面的论文 50 篇。今天看来，其中一些研究已经落后于现时的学术发展，甚至还有一些错误；另一些研究虽然得到过学界首肯，但自己仍然觉得有许多细节尚欠推敲，至少是还有补充的余地。现在决定集中发表这些多年前的作品，主要是想借此向青年学者展示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告诉他们一个求学的人应该怎样沿着这条道路苦苦前行。

在原来文稿的基础上，这本论文集对收录的文章进行了四方面的技术加工：

第一，有些文章用到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当初这些文字都是经手写然后集中照相制版的，在行文中只能用数字指代。现在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这个论文集里的少数民族文字得以一律改用电脑录入，并取代原来的数字编号插入行文中间，以便阅读。当然，前后叙述文字也作了略微的改动。

第二，有些文章中引用的音标形式在当初发表时进行了简化，例如省略了调号和紧元音符号等，为的是减少铅字排版的麻烦。现在这本论文集因采用电脑录入，因而得以将简化的音标形式一律复原。

第三，原来的文稿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编辑体例各不相同。本论文集在不影响原有内容的前提下进行了体例的统一。

第四，十几年前我国的刊物不刻意要求注释格式的规范，甚至为了排版方便还会要求作者删减注释。本论文集遵照近年来的学术论文要求，尽可能地原来发表的文章补出了一些脚注，统一放在每页底端。

聂鸿音

2012 年 9 月 5 日

## 目 录

|                        |       |
|------------------------|-------|
| 番汉对音简论 .....           | (1)   |
|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        | (11)  |
| 慧琳译音研究 .....           | (23)  |
| 《切韵》重组三四等字的朝鲜读音 .....  | (38)  |
| 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 .....   | (49)  |
| 《金史》女真译名的音韵学研究 .....   | (62)  |
| 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 ..... | (78)  |
| 梵文 jñā 的对音 .....       | (88)  |
| <br>                   |       |
| 西夏语音商榷 .....           | (93)  |
| 西夏残经注音藏文的前加字 .....     | (112) |
| 《文海》韵的内部区别 .....       | (128) |
| 论《文海》第一摄及有关问题 .....    | (141) |
| 西夏语松紧元音假说评议 .....      | (154) |
| 西夏语的小舌塞音 .....         | (171) |
| 论西夏语的 -j- 介音 .....     | (175) |
| 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时间界限 .....    | (185) |
| 西夏词源学浅议 .....          | (195) |
| 西夏的佛教术语 .....          | (207) |
| 试析西夏语表“五色”的词 .....     | (214) |
| 西夏语谓词人称后缀补议 .....      | (224) |
| 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 .....   | (230) |

|                                 |       |
|---------------------------------|-------|
| 契丹大字解读浅议 .....                  | (239) |
| 关于契丹大字的拟音问题 .....               | (249) |
| 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 .....            | (259) |
| 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 * - n 和 * - in ..... | (274) |
| 辽代诗文用韵考 .....                   | (281) |
| 《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 .....               | (292) |
| “女真”译音考 .....                   | (295) |
| “深层对应”献疑 .....                  | (301) |
| 论“八思巴字梵语” .....                 | (312) |
| 鲜卑语言解读述论 .....                  | (324) |
| 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 .....             | (337) |
| 道光《石泉县志》中的羌语词 .....             | (347) |
| 道光《白山司志》中的壮语词 .....             | (357) |
| 《河西译语》探析 .....                  | (364) |
| 敦煌 P. 988 号藏文写卷考补 .....         | (374) |
| 西夏文献中的吐蕃 .....                  | (386) |
| 张掖河别称考源 .....                   | (396) |
| 说“日”字——非汉民族借用汉字的早期证据 .....      | (399) |
| 近古汉语北方话的内部语音差异 .....            | (403) |
| 汉语西北方言泥来混读的早期资料 .....           | (414) |
| 西夏黑水城出土韵书残页考 .....              | (416) |
| 俄藏宋刻《广韵》残本述略 .....              | (424) |
| 智公、忍公和等韵门法的创立 .....             | (428) |
| 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 .....           | (433) |
| 从谐音字和叶韵字论《红楼梦》的基础方言 .....       | (436) |
| 中国文字的文化内涵及其表现层次 .....           | (444) |
| 关于“坡芽歌书”的两个问题 .....             | (452) |
| 音节简省是外来新词语规范化的首要原则 .....        | (459) |
| 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 .....           | (463) |

# 番汉对音简论

番汉对音，即汉语和外民族语言音译材料的对勘，是 20 世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其应用并不太广泛，人们对它的评价也不太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利用番汉对音一般只能得到汉语和外族语言间的“转写”规则，这些规则还不够严密规整；其次，目前人们对番汉对音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以致使用时的原则很不统一。在这两个因素中，前一个只能看成是对音法的“先天不足”，后一个则有望通过深入的讨论而逐步得到澄清。本文的目的就是讨论在对音过程中容易出现理论和实践偏差，以期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更加科学地使用这种方法，让它在汉语音韵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一 历史的回顾

在我收集的资料中，最早使用对音法研究汉字古音的例子见于艾约瑟的《汉字研究导论》。<sup>①</sup>这本书只从汉译佛典中引了很少几个对音词，把梵文和有关的几个汉字大略地加以比照，从中人们虽可隐隐看出汉语果假二摄主元音为 a 的迹象，但由于材料过于零碎，所以无法据以得出什么系统的结论。

20 世纪 20 年代，番汉对音正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登上了汉语言学的舞台，作为其标志的是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钢和泰的《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sup>②</sup>另一篇是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sup>③</sup>前者明确指出了汉文佛经中的梵语译名对于考求汉语古音的作用，

---

① J. Edkin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ondon: Trübner & co., 1876.

② 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胡适译，《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1923。

③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2 号，1923。

犹如番汉对音的号角，后者则公认是这种方法在音韵学领域的首次实践。汪荣宝的这篇论文留给后人的既有成功的先例，也不乏失败的覆辙，因而在当时的音韵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但这些意见大都针对着番汉对音在使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而对于这种方法本身，人们则没有提出过多的异议。

从 20 年代开始，番汉对音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汉语研究，所涉及的番语文（外民族语文）主要有梵文、日语、朝鲜语、越南语、藏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

在全部的对音资料中，佛经的梵汉对音是最丰富的一种，它上起东汉，下至宋元，涉及的语言和方言遍布中原和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其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广是任何一种对音资料都不能企及的。研究梵汉对音的名著当首推马伯乐的《唐代长安方言考》，<sup>①</sup>文中提出唐代长安话的全浊声母为鼻冠音（mb-、nd-）的假说，引起了音韵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后又有罗常培提出中古知彻澄娘四个声母当读舌尖后音而不读舌面前音，<sup>②</sup>俞敏提出汉代入声的塞音尾当读浊音而不读清音。<sup>③</sup>其他研究者还有水谷真成、尉迟治平、施向东、刘广和等。

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保留的汉字古读一般称为“域外方音”，其中日译吴音借自 5 至 6 世纪的汉语吴方言，日译汉音、朝鲜译音和越南译音则借自隋唐时期的北方话。这四种译音的特点是系统性强，几乎是《切韵》每个韵的字都可以在译音中找到，因而不难据以归纳出一个完整的对音体系。20 世纪初，高本汉首次综合利用这些材料来构拟《切韵》古读，写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sup>④</sup>此后，分别研究这四种译音的主要还有张世禄、王力、藤堂明保、河野六郎、桥本万太郎等。

藏汉对音资料主要是出于敦煌的几种藏文残卷，反映了公元 8、9 世纪之间敦煌一带的汉语方言，罗常培的名作《唐五代西北方音》便是利用这批材料写成的。<sup>⑤</sup>

借助西夏文对音来研究 12 世纪河西地区的方言，这是王静如在 30 年

① H. Maspé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2, 1920.

②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 本第 1 分，1930。

③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论文选》，东京：光生馆 1984 年版。

④ B.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1915-1916.

⑤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

代做出的尝试,不过当时他的目的只在于拟测西夏字音,而对于汉字读音不过是顺便论及而已。专门利用这批材料研究汉语方言的当以龚煌城为代表,在题为《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的一篇长文中,<sup>①</sup>龚煌城令人信服地归纳出了宋代西北话的声母系统。可是,西夏文毕竟不是一种能直接显示读音的拼音文字,因而目前谁也无法对这个方言的复杂的韵母系统做出考证。

八思巴字和汉语的对音资料主要是《蒙古字韵》和《百家姓》。利用八思巴字对音来研究汉语音韵始于龙果夫的《八思巴字与古汉语》,<sup>②</sup>近期的研究者则有杨耐思等人。现存的八思巴字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其中的《蒙古字韵》严格地按汉语声韵类排列,人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14世纪北方官话的音韵格局。

除了上述的几种对音资料外,历史上还有吐火罗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文字的对音,明清两代又有数十种《华夷译语》的对音,但这些资料或者过于零散而不成系统,或者所反映的汉语读音过于晚近,所以没有在学界引起足够的注意。

事实上,除了汪荣宝大力主张梵汉对音是“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以外,学界对番汉对音的评价普遍不高。高本汉在《佛经对音中的汉字古读》一文里就指出,<sup>③</sup>梵汉对音显示的是一堆极为粗略的零散字音,充其量只能为内部构拟的结论提供旁证,却远远不足以推翻运用历史比较法拟出的古音系统。我们当然也看到,假如无条件地把对音结果误认为是代表了古代汉字的精确读音,就往往会在某些地方违反历史语言学的原则。例如据汪荣宝的研究,汉语遇摄和果摄的古读都是a,这作为对音当然没有什么疑问,但却无法解释遇、果两个韵摄在后代的发展。按理说,相同的音在相同的条件下只能发生相同的演化,这样人们自然要问:遇果二摄既然在古代都读a,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它们在后代一个变了u,一个变了o呢?

① 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1。

② A. Dragunov, *The ḥ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30. 唐虞汉译本《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B. Karlgren, *Prononciation ancienne de caractères chinois figurant dans les transcriptions bouddhiques*, T'oung Pao 19, 1919.

未能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甄别材料，也是汪荣宝的一大失误，这已被后人反复地指出了。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中，汪荣宝的目的本来是要证明果摄在唐宋以前和遇摄在魏晋以前的读音，但他所使用的对音证据却显得杂乱无章——东至日本，西至波斯，早至汉代，晚至元初。中国古代的方言相当复杂，讲音韵学时如果不把材料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那么不管其结论如何确凿，也不易得到学界的普遍首肯。

季羨林写过《浮屠与佛》和《论梵文 *t*、*d* 的音译》两篇论文，<sup>①</sup>从另一个角度动摇了梵汉对音的基础。他发现，早期汉语的“佛”并不是译自梵文的 *buddha*，而是译自吐火罗文的 *bud*，汉译佛经的一批来母字也不是译自梵文的 *t*、*d*，而是译自巴利语的 *l*。从而他指出，唐以前佛经的母本大都不是梵文，而是吐火罗文或巴利文，当前人们用梵文来研究汉唐之间的汉语音韵，实际上是一大误区。这个结论虽然有些绝对化，但毕竟提醒人们，研究对音时切不可忽视对原语言的确定。

总的来说，迄今人们对番汉对音的评价大都和它的实际使用原则纠缠在一起，而直接针对资料本身的论述却不多。随着这种研究方法在当前的日益普及，我们应该对原材料的语音学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 二 对音资料的价值评判

对于一份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对音资料来说，评判其语音学价值的标准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它所提供的声韵系统是否完整无缺，另一个是它标示语音的精密程度。

严格说来，要达到第一个标准，对音资料中必须出现当时当地汉语中的全部音节，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详细收录汉语全部音节的书只有一部《切韵》，后代的《广韵》和《集韵》等虽然收字多些，但其声韵系统却基本因袭《切韵》，不能认为是代表了宋代的语音格局。至于元代的《中原音韵》，则纯粹是一部“曲韵”。这样，《切韵》音系便无形中成了音韵学界约定俗成的分类标准。在番汉对音的研究中，人们都习惯于尽量用《切韵》音系的分合来解释其语音特征。因此，任何

<sup>①</sup> 季羨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论梵文 *t*、*d* 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

一套对音资料，即使它真的提供了当时当地完整的音韵格局，但只要不能覆盖《切韵》的全部音节，就都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覆盖《切韵》全部音节”这个标准看来是过于苛刻了。在人们研究过的所有对音资料中，也许只有朝鲜译音能基本满足这一要求，而其他受到高度重视的材料如日本译音、越南译音、八思巴字《蒙古字韵》等，或多或少都“遗漏”了《切韵》的音节。这样，只好把理想的标准降低一些——提供《切韵》（《广韵》）中全部的声类和韵类，有关语言或方言的全部音节可以通过声韵类的搭配规律推导出来。例如心母覃韵的“𪛗”字，它从来不在梵汉对音中出现，但我们却知道心母“须”字的对音是 su（须弥楼 sumeru），覃韵“南”字的对音是 nam（南无 namo），由此推断，“𪛗”字如果用于佛经翻译，它的梵文对音必是 sam。

初看起来，似乎对音材料中只要包括 47 个不同的汉语声类和 90 个不同的汉语韵类就够了，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许多对音材料来说，这个已经降低了的标准仍然过高。事实上，除了可以用来编集或翻译字典的日本译音、越南译音和八思巴字对音之外，其他对音没有一个能满足这个要求。例如《广韵》平声臻韵所收的字都比较冷僻，汉人平时写文章都很少使用，更谈不上用它们来对音了。事实尽管如此，标准却不能再降低了，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材料中，朝鲜译音、日本译音、越南译音和八思巴字对音的价值较高，而梵汉对音、汉藏对音等，其价值就相对低些。

相比之下，要恰如其分地判断资料的表音精确程度，其困难就稍大一些，这需要把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此前人们往往认为，音位或音节文字的表音精确程度要高于汉字系统的方块字。例如西夏文献中现存有两套对音材料，一套是《番汉合时掌中珠》里的汉字对音，另一套是黑水城所出几张佛经残页的藏文注音，<sup>①</sup>西夏学界普遍认为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于是在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中，每当汉字对音与藏文对音发生某种矛盾时，人们一般都抛开汉字而遵从藏文。实际上，这显然是错误地把音符文字表音的“直观性”与“精确度”混淆起来了。不容置疑，拼音文字使人比较容易直接体会到读音，而一旦面对方块汉字，人们体会读音就要多费一番周折，这不仅需要综合运用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而且有时还

① 这两套对音材料的初步整理见 N. A.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4, 1926.

要花一些考据的工夫。按理说，所有人在用母语文字来给外民族文字注音的时候，总是要力求精确的，而这些对音在今天看来有些“不精确”，其原因无非来自两方面。一是两种语言本身固有的音位差异，比如今天人们把俄语音节 pa[ra]译成“拉”，原有的那个舌尖颤音是汉语怎么也译不精确的，所以只好选用近似的流音来替代一下。另一方面是历史上的问题。所有的语言，不管是不是用音符文字记录的，都毫无例外地在变化着。既然我们知道今天的汉语和古代不同，那么又为什么要假定今天的藏语、梵语读音和千百年前相同呢？事实上，拼音文字并不一定有助于保持造字初期的读音，著名的英语元音音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设想一下，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人看见 date、bad、about 这样三个书写形式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其中的三个字母 a 应该分别读成[ei]、[æ]和[ə]呢？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就对音的精确程度而言，音符文字和意符文字的价值是相等的，它们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精确。

实践证明，不管对音材料是用拼音文字记录的还是用非拼音文字记录的，其表音的精确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从对音材料的编纂目的来看，专供学习语言的材料优于一般性的音译。前者如佛经中的咒语、《蒙古秘史》、《番汉合时掌中珠》、《华夷译语》等，其目的是让人们尽可能地从字面上理解原语言的发音特征，所以编纂人在选用对音字时总要反复斟酌，以保证两种语言间较严格的音位对应关系。为此，他们往往不得不采用一些极为冷僻的字，甚至有时还创造一些附加的符号来指明原语言的特殊发音。例如唐以后的汉译佛经咒语习惯在来母字加上“口字旁”来表示梵文的舌尖颤音 r（罗 la： 啰 ra），《蒙古秘史》在晓母字左上角加上一个小“中”字来表示蒙古语的小舌塞音 q（罕 han： 𑖯罕 qan），等等。而后者如佛经正文中的梵语译名、“二十四史”中的少数民族译名等，它们实际上已被看成是汉语的组成部分，译者只要求它们能让汉人感到“上口”，而并不在乎读出来是否精确。例如“菩萨”这两个汉字谁念起来也不感费力，但它们的实际发音距梵文的 bodhisattva 已经很远了。

第二，从对音的方向上看，双向对音的材料优于单向对音。所谓双向对音，指的是在同一份材料中既有从番文译成汉文的，又有从汉文译成番

文的。符合这个标准的实际上只有《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中既有西夏文—汉文对音，又有汉文—西夏文对音，两方面的材料彼此补充，互相参照，因而显得极有价值。

第三，从原语和译语的声韵类数目来看，译语声韵类多的材料优于声韵类少的。当然这仅仅是从原则上而言，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哪一种对音中出现了汉语的全部声母和韵母的对立，因此，这个价值评判标准往往要限制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使用。例如梵文的双唇塞音有 *p*、*ph*、*b*、*bh* 四个，而古汉语只有 *p*、*ph*、*b* 三个，这样，魏晋僧侣在翻译佛经时，就不得不用汉语的 *b* 来同时翻译梵文的 *b* 和 *bh*，从而掩盖了二者之间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于是我们就看到，在证明古汉语全浊声母是否送气这个问题上，梵汉对音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与此相反，古藏族人习惯把字母 *ha* 加在 *ba* 的下面来翻译外族语言的 *bh*，也就是说，藏文的双唇塞音实际上可以有 *p*、*ph*、*b*、*bh* 四个，用这四个音来对译古汉语的 *p*、*ph*、*b* 三个音时，必然有一个音（*bh*）根本不出现。这样我们就认为，在证明古汉语全浊声母是否送气这个问题上，汉藏对音是有价值的。

### 三 番汉对音的“替代”原则

给对音材料的价值做出恰当的评判，并不等于解决了对音的全部问题。在番汉对音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大量字音和原语不相符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客观上的，也有译音人主观上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自然的语流音变在译音中的反映，如 *saṃga* 译作“僧伽”，是因为梵文 *saṃ* [sā] 受后面舌根辅音的同化而变读成 *saŋ* 了；而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在译语中找不到与原语完全相同的音，因而不得不有意地借用其他的音来代替它。

古人译音的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活语言的运用过程，这种过程自然要受到语音学普遍规律的无形制约。事实上，普通语音学的绝大多数音变规律都可以在对音中得到反映，如同化、异化、增音、减音、易位、替代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替代现象。

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音位都可以在对音中互相替代，例如现代藏语 *lhasa* “拉萨”一词的起首音 *lh* [ɬ] 是汉语所没有的，汉人现在习惯用 *l*

来替代，而绝对不能用 *m* 或其他的什么音。这显然说明汉人认为与 *lhasa* 最相近的音是 *lasa*，而不是 *masa* 或 *kasa* 之类。那么，人们据以判断“听起来像”或“听起来不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语音学告诉我们，辅音的发音特征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和清浊，如果是塞音或塞擦音，还要加上一个送气与不送气的问题。按理说，在译音时能满足这四个条件中的三个就可以了，如以“海明威”译 *Hemingway* 为例，其中“海”的声母 *x* 与英语 *h* 只有发音部位的不同；如“理查德”译 *Richard*，其中“理”的声母 *l* 与英语 *r* 只有发音方法的不同；如“弗吉尼亚”译 *Verginia*，其中“弗”的声母 *f* 与英语 *v* 只有清浊的不同；如“斯通”译 *Stone*，其中“通”的声母 *th* 与英语 *t* 只有送气的不同。这些音译虽与原语不尽相当，但在今天都可以认为是最近似于原语的。然而事情有时却并不这样简单。以印欧语的浊擦音 *z* 为例，按上述原则，它似乎应该音译成汉语的 *s* 才对（*Arizona* 亚利桑那），但我们看到，*Zola* 实际译成“左拉”而不是“索拉”，*Zambia* 实际译成“赞比亚”而不是“三比亚”。汉语“左”和“赞”的声母 *ts* 在发音方法和清浊两个方面都与 *z* 不同，而这种替代同样能让中国人愉快地接受，这是什么缘故呢？

答案恐怕和对语言的民族心理感受有关。有的语言中清浊音位的对立不够丰富，那么使用这个语言的民族对清浊的感受必然就比较迟钝，有的语言中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不够丰富，那么使用这个语言的民族对送气的感受必然就比较迟钝。以 *p*、*ph*、*b* 这三个塞音为例，现代汉语只有前两个而没有第三个，说明汉人对送气与不送气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清浊，所以在音译外语的浊辅音 *b* 时，汉人总是习惯用同为不送气音的 *p* 来替代，如 *Bloomfield* 译成“布龙菲尔德”。同是这三个塞音，英语只有后两个而没有第一个，说明英美人对清浊的重视程度超过了送气与不送气，所以在音译外语的不送气辅音 *p* 时，英美人总是习惯用同为清音的 *p'* 来替代，如“北京”译成 *Peking* [*p'ik'ij*]。这些译例虽然不是出自音韵学家之手，但我们却看到，古代的音韵学家在音译外族语音时，同样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遵循着这些普遍的规律。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缺乏不同发音部位的对立，至少唇、舌、牙这三个

音几乎总是要有的,所以各民族的人都对辅音的发音部位极为敏感,在古往今来的译音资料中也极少出现不同发音部位的替代。这方面的例外情况大约只有阿尔泰系语言的小舌塞音 q。汉语里根本没有小舌部位的语音,人们在译音时只好借用发音部位相近的舌根音 k' 或 x,如《新唐书》译 qahan 为“可汗”,《辽史》译 qus 为“虎思”,等等。

不同发音方法的替代比发音部位的替代常见一些。汉番对音的例子大都与汉语的 ts-、ts'- 有关。汉族地区周围的许多语言都没有这两个舌尖塞擦音,外族人在音译汉语带 ts-、ts'- 的音节时一般习惯借用同部位的 s- 或 t-、t'-,如女真语译“太祖”为 taisu,译“慈圣”为 sishin;<sup>①</sup>日语译“精”为 sei,译“草”为 sau,等等。另外,番汉对音的例子大都与梵文系统的 t[t̪]、th[th̪]、ḍ[ḍ̪], ḍh[ḍh̪] 有关。汉语里只有舌尖后塞擦音而没有舌尖后塞音,所以每当遇到梵文的这四个音的时候,唐以后的人们一般习惯用同部位的 tʂ-、tʂ'-、dz- 来替代,如译 kukkuṭa 为“究究吒”,译 paṇḍaka 为“半择迦”,等等。

梵语的塞音四个为一组,构成了一个严整的系统,即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不送气浊音、送气浊音,然而我们却很少见到中国境内还有哪一种语言或文字的声母系统如此详备。古代汉语、古代藏语和西夏语是三个为一组,即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浊音,而其他的语言(包括近古汉语)则一般只是两两成对而已。所以,至今所见音译中清浊的替代和送气不送气的替代极多,例子已不胜枚举了。概括说来,清浊的替代大都出现在只能区别送气与不送气的语言里,而送气与不送气的替代则一般出现在只能区别清浊的语言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对音中常见的替代现象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级的标准是发音部位,这一级最为严格,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古人绝不轻易用发音部位不同的语音来互相替代。第二级的标准是发音方法,古人可以用发音方法不同的语音来互相替代,但前提是发音部位必须相同。第三级的标准是清浊和送气,这一级最不严格,但如上所述,在一种具体的语言中,清浊与送气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并列的,究竟哪个重要些,还要参照该语言的音韵系统才能决定。

① 金启葆:《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9、85 页。

至此我们得出结论，番汉对音用于考察辅音的发音部位是最可信的，而用于考察其他特征时，其可信程度就稍差一些。推而广之，番汉对音作为音韵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既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一无是处，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无懈可击。只要我们能从以上所谈的几个方面对材料和方法的价值进行认真的分析，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必然能在音韵学和文献学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原载《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第70—75页）

##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利用番汉对音来猜测汉字古读的尝试发端于 19 世纪，而译音对勘作为一种正式的研究方法在音韵学界得到应用，则当以 20 世纪初钢和泰的倡导和汪荣宝的实践为标志。<sup>①</sup>从高本汉开始，学界对番汉对音的责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sup>②</sup>现在仍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这里面的缘故当然是复杂的，除了人们从心情上难以接受译音对勘法所表现的反传统精神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们注意到，此类研究的开创者汪荣宝对自己信手拈来的对音资料往往未从历史角度加以细致的甄别，使得其相关的结论并没有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事实上，自从四十年前蒲立本开始使用番汉对音资料研究上古汉语之后，<sup>③</sup>这种只注重音理分析而不注重原始语料考订的风气便呈愈演愈烈之势，终使得一些传统音韵学者对番汉对音丧失了信心。蒲立本用汉代的对音资料去研究比资料还早八百年的上古汉语，这给人一种“时代错乱”的感觉，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译音对勘是研究汉字古读的有效方法之一，问题在于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应该怎样科学地使用它——始创于唐代的藏文距离原始汉藏语时代无疑更为遥远，但这并不妨碍藏文成为人们拟测原始汉藏语的重要资料，其间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译音对勘法本身提出质疑，而是希望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使这种方法在今后的应用中变得严密起来。

---

① 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胡适译，《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1923；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2 号，1923。

② B. Karlgren, *Prononciation ancienne de caractères chinois figurant dans les transcriptions bouddhiques*, *T'oung Pao* 19, 1919.

③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1962, 1963. 潘悟云、徐文堪汉译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 2000 年版。